

往事漫談

徐慶譽

——憶說五十年前的文化運動（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三五頁）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七月中國

攻武漢，我正在這時候從英國牛津出發，道經波蘭、蘇聯、西伯利亞回到上海，開始在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學術講演工作，並在光華大學擔任哲學講席。民國十六年與上海學人及英美教育家發起「世界學會」，以介紹世界學術、溝通東西文化為宗旨。除在各大學講演外，並發行叢書及「知難周刊」，以闡揚三民主義、評判馬列主義及傳播中國固有文化為目的。我所著的「美的哲學」、「文化論」、「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及「評共四講」，都是在這時候出版的。當時對「世界學會」贊助最熱心的有余日章、顧子仁及鮑乃德 (Eugene Barnett) 諸位先生。

愛的哲學七種信仰

民國十六、十七兩年在上海各大學的講稿，先後在知難周刊登載。當時一般青年最感興趣的一篇講稿，也許是「我的七種信仰」。那時期胡適之先生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校長，楊亮功先生任副校長。胡先生邀我到大學部講演，我把自己的七種信仰介紹給聽眾。我的七種信仰是代表

我個人的人生觀與宇宙觀。列舉如左：

- (一) 我信宇宙為一有目的有機體。
 - (二) 我信世界日趨於大同。
 - (三) 我信人性日趨於良善。
 - (四) 我信精神不朽。
 - (五) 我信個人有無限能力。
 - (六) 我信宇宙無限，科學的進步亦無限。
 - (七) 我信愛即真理。
- 全篇講稿冗長，此刻不能一一敘述。惟最後一項發揮愛即真理關係重大，有重述的必要。全文刊在「學術論叢」一書中，現在摘錄如左，以供大家參考。

「我在此處所講的愛，不是單指男女兩性的愛與親子的愛，乃是泛指『人類的愛』。人類的道德是出於愛，愛即孔子所講的『仁』，『仁』是兩人相互依有的關係；愛的反面即是『恨』，『恨』是人類罪惡的淵藪。凡高尚的人生哲學、偉大的宗教以及健全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或經濟制度，無一不是以『愛』為基本原則。我們為甚麼說強盜不是好人？為甚麼反對侵略主義與馬列主義？為甚麼反對戰爭？不是因他們違

反愛的原理嗎？可見人類惟一的生路，即是一條『愛的路』。現在人類還沒有完全走上『愛的路』，雖有國際聯盟一類的世界機構，仍舊不能防止殘酷的戰爭與國際間一切紛爭、猜忌與仇恨。我們要挽救世界文化與促進人類和平，就當提倡愛的教育，建設愛的環境，創造愛的人生；打破人我、國家、種族、文化及宗教的界限，以天下為一家，以四海全人類為兄弟。要達到這一理想的目的，就不能不以國際主義（大同主義）代替狹義的國家主義；不能不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代替專制獨裁的馬列主義；更不能不以和平主義代替殘暴的戰爭。

斯多葛派 (Stoics) 的哲學、基督教與佛教的基本原理以及近代托爾斯泰 (Tolstoy)、柴門哈夫 (Zamenhof)、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羅素 (B. Russell) 以及威爾斯 (H. G. Wells) 諸人的思想，都是以人類的愛為出發點。中山先生鼓吹『天下為公』，提倡三民主義，也完全以人類的愛為中心思想。中國文化可說是一種『愛的文化』。試讀禮記的大同篇、墨子的兼愛論、程明道的識仁篇、張橫渠的西銘以及近代譚嗣同的

仁學，都足以代表中國傳統的「愛的文化」（詳見拙著「愛的哲學」）。

迎頭痛擊左傾狂潮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我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及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先生共同發起「南京學術講演會」，每逢星期六晚在教育部禮堂舉行學術講演，敦請學者專家公開講演，以機關學術化、國家近代化爲主旨。同時我在中央大學講演「大我哲學」、在金陵女大講演「孔子哲學」及「新人生哲學」、在金陵大學講演「孝與中國文化」。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因鑒於當日一般青年受陳獨秀、魯迅等左傾文字宣傳的影響，共產黨反動的潛力日益擴張，湖南的首府長沙一度被共黨攻破。爲了抵禦紅色恐怖，打擊馬列主義，乃與陳立夫先生研討轉移風氣與收拾人心的基本對策。於是決定將世界學會總部由上海移到首都南京，我與立夫先生擔任該會的執行委員。爲了加強黨外的思想運動與文化工作，乃發行「長風半月刊」，對當日左傾狂潮予以迎頭痛擊。除發行定期刊物以外，爲了促進國家現代化，我草擬了「十年建設計劃大綱」，除在京滬各報披露以外，由世界學會印成專冊，分發各機關參考。

擴大黨外文化運動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爲了加強對共黨的思想鬭爭、宣揚三民主義及糾正知識青年左傾的頹風，擴大黨外的文化運動與樹立中央的威

信，我提議由世界學會組織「學術講演團」，邀請學者專家分赴華北、東北各大學講演。受聘請的學人有楊亮功先生（安徽大學校長）、朱經農先生（教育部次長）及仇愨先生（考試院銓敘部副部長）等。我隨同他們到濟南、天津、北京、遼寧等地各大學及政府機關講演。楊亮功先生與朱經農先生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言論深入人心，對當日青年思想的轉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可惜他們的學術講稿現在無法找出來；朱、仇兩位都已先後去世，幸亮功先生健在，也許他還能回憶。我個人目前所能回憶的有幾個頗重要的題材，一是我在北京大學所講的「機械工業與文化」，全篇講演的要點即是主張中國現代化，務須使農業工業化、工業機械化。一七六九年瓦特（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以後，逐漸形成了產業革命，使手工業變成機械工業；同時產生了資本主義，因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發生了許多流弊，又產生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派別分歧，如「費邊主義」（Fabianism）、「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工團主義」（Syndicalism）與「共產主義」（Communism）或「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都號稱社會主義。機械工業促進了近代國家的物質文明，對世界文化的貢獻非常偉大。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人民窮困，尤其是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極低。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必須全國工業化，這是全篇講稿的要旨，全文由天津大公報轉載。在力行社出版的「文化論」一書中，也把

這篇講演詞全部刊印，可惜「文化論」一書連同當時出版的「學術論叢」、「美的哲學」，以及「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等書，自共黨竊據大陸以後都已散失。

講演闡揚三民主義

關於闡揚三民主義的講演，分別在濟南齊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國立師範學院及遼寧省教育會等處舉行。講題有三：（一）三民主義與民主。（二）三民主義在現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三）孔子與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民主」講詞的結論如左：

中國的歷史與固有傳統的文化富有民主精神，書經大禹謨篇說：「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書經胤微篇說：「每歲孟春，逾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書經五子之誥說：「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孟子對民主更加推崇，他說：「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周官小司寇說：「掌萬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中國古代政治家尊重民意，如周朝的召穆公反對厲王監謫，贊成人民批評時政，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鄭國的子產不毀鄉校，准許人民批評執政，以民爲師，他說：「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所以中山先生曾對英國某領事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

二千餘年。」（民族主義第四講）總之，中國的民主思想有悠久的歷史，不是舶來品。三民主義即是社會民主、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合流。要實現民主，就當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民主國家的人民必受科學教育與政治道德的訓練；從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物須有民胞物與、已饑已溺的胸襟，才可以實現民主的崇高理想。

發揚中國固有文化

國家興衰與政治得失都與時代思潮息息相關。十五年北伐，打倒軍閥，完成統一，是三民主義影響。陳獨秀、李大劍等瞎吹馬列主義，又使中國人民受共產黨的奴役。現在回憶五十年前的文化運動，感慨萬千。也許讀者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自民國二十年以後到現在（民國七十三年）又是半個世紀了，我在這半個世紀中對文化事業究竟做了些甚麼？說起來非常慚愧。往事不堪回首，徒然虛度韶華。在抗戰前夕，我在先總統蔣公南昌行營代理陳布雷先生主持「設計委員會」，同時協助蔣公促進劃時代的新生活運動。蔣公派我率領「新生活視察團」，視察全國新生活運動，因此有機會在各大學講演，寓講學於視察中，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及傳達蔣公的政治理想與施政方針。同時又開揚孫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理論，在各省市講演顏習齋動的哲學，強調力行爲國家現代化的基本條件。

極力主張反共抗日

民國二十五年發生震撼全球的「西安事變」

，幸天佑中國，蔣公平安返抵南京，這一年是蔣公五十大慶的一年。日本在這時候，侵略中國的暴行與日俱增，我國內共黨也乘機發難。爲了挽救危局，我極力主張對日作戰，也反對與共黨合作，乃草擬「對日作戰總動員方案」，又題爲「蔣委員長五十壽辰紀念書」，全文共一萬二千多字，數陳長期抗戰的政略與戰略，主張於必要時放棄東南沿海陣地遷都華西，建設西北與西南的國際路線，以便取得英、美等國的外援；強調「中國問題，乃世界問題。英美決不放棄遠東，日本焉能獨吞中國？與其妥協而亡國，不如頑抗以圖存。」且預言在中日戰爭期間，歐戰亦將爆發，初期戰爭希特勒將空前勝利，打敗英法聯軍；屆時美國必參加歐戰，支援英法。希特勒在美軍龐大軍力壓迫之下，勢必投降。同時東方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也因英美的積極援華而瓦解。我的預言不數年間完全成爲事實。（我是基督教的信徒，經常爲國家祈禱。我的預言不是由於個人的智慧，乃是由於神的啓示。）這是我對國家區區的貢獻。

體念締造民國艱難

抗戰期間，重慶中央當局爲了鼓勵士氣，加強國志，命我到各地軍事教育機關及青年軍所在地作學術講演。我在陸軍大學、空軍學校及青年軍各師部講演「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在重慶中央警官學校講演「易的哲學」，在湖南南岳西南幹部訓練班講演「大我哲學」及「孔子哲學」與「中國現代化必由之路」。不論在甚麼地區與

甚麼機構，每次講演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即是：「抗戰勝利以後，建設開始，希望全國同胞，體念先烈締造民國的艱難與歷年抗戰的犧牲流血，大家精誠團結，力求社會安定與政治修明。務須於今後數十年內，將國家工業化的程度趕上西方；同時將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種建設與政治建設」配合起來，使國家成爲一個現代化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同富主義與新時代

自民國三十八年共黨占據大陸以後，我流亡香港八年，仍舊從事文化工作。一面先後在崇基書院、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講學以外，編著了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英文稿）及「同富主義與新時代」兩書。民國四十七年由香港移寓美國紐約以後，除經常在東部各大學講演以外，一面爲聯合日報「新思潮」寫稿；一面編著了一部「暴秦滅亡記」（劇本）、「中國問題」及「長島詩存」。當年一同從事文化運動的老友，幾乎都已去世，今日依然健在的還有陳立夫、楊亮功、黃少谷、劉振東及丁治磐幾位先生。這幾位文化老戰友，對黨國都有偉大的貢獻，只有我個人自慚老大，無補蒼生。回憶五十年前往事，自是感慨萬千。中國復興大業，仍寄望於現存的老友及後起的愛國青年，絕對不因神州陸沉而悲觀失望。今我將八十初度與八十五生辰兩次所感賦的七律一章及七言絕句四章，抄錄如左，以便讀者明瞭我晚年流亡海外的心情，希望海外諸友不遺在遠，時賜箴規。